

左宗棠评传

杨东梁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序

胡绳武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为人们所熟悉的有影响的人物。他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他的一生同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有密切的联系。他既参加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西北回民军的反清斗争，也曾全力投入收复新疆的斗争，并以垂暮之年驰骋于抗法战争的前线。在千姿百态、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左宗棠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对左宗棠的生平，特别是他在这些历史进程中的表现与影响，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了解，也会提高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对有关左宗棠资料的蒐集与研究，在左宗棠死后不久就有人开始尝试了。这就是1897年湘阴左氏刊刻的《左文襄公全集》附录的罗正钧的《左文襄公年谱》。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人们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极为不满，而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曾为清廷效劳，故被视为汉奸。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刊物《民报》临时增刊《天讨》上，在“过去汉奸之变相”的标题下，就曾书登过其下身为禽兽的曾、左、李的头像。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当然不会有人对左宗棠进行认真的研究。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山河破碎，民

2243/15

族危机空前严重，因而“边政”问题就为人们所注意。于是，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史事，开始有人进行研究，还有人^①对左宗棠在西北地区的活动作了专门研究。当时将研究所得写成专著并出版的有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和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

据我所知，首先为左宗棠写全传的是美国人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与政治家》（1937年上海版）。此外，陈其田、戴慕贞也写过左宗棠的传记。陈是用英文写的，书名为《左宗棠，近代中国造船业与毛纺业的先驱》（1938年北京版）。日本人西田保也写过《左宗棠与新疆问题》的专著。

·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镇压过农民起义，是洋务派的大官僚，因而学术界发表的论著多把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看成是一丘之貉。即使对他的驱逐阿古柏侵略者、收复新疆一事加以肯定，也只是视为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很少有人对他一生的思想和他的军、政设施，作认真的系统研究。这样，在已刊行的论著中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阐明：左宗棠虽然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都是洋务派的大官僚，并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出发，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他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和他对于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却与曾国藩、李鸿章有所不同。而由于这种不同，故他们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就必然不侔。事实上，忽视这些区别，正是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研究左宗棠所存在的不容讳言的缺陷。近几年来，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史学研究中日益得到发扬，不少文章对左宗棠在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行动；在洋务运动中从“富国强兵”的意图出发，自尊自信，不迷信洋人的指导思想；克服极大困难，坚持进军新疆，

驱逐阿古柏侵略者、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他的关于将新疆建为行省和开发西北利源的深远战略眼光；他在所供职地区的革除弊政、救灾救荒、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的治绩等等，都有所论述。但限于篇幅，大多言而不详。因此，在详细地占有材料并将其认真钻研的基础上，写出一部学术性的左宗棠评传，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杨东樑同志有志于此，从1979年初开始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于1983年写出了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左宗棠评传》。由于作者征求我对书稿的意见，因得先读为快，并获益良多。据我所见，这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搜集的资料比较丰富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仅查阅了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各大图书馆所藏的左宗棠的遗著（包括文集、家书、信札、墨迹、遗摺、未刊手稿等），而且浏览了与左宗棠同时代的有关人物的著作。其中包括陶澍、林则徐、贺熙龄、魏源、胡林翼、郭嵩焘、骆秉章、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刘坤一、沈葆楨、钱鼎铭、潘祖荫、刘锦棠、侯名贵、陶模、曾纪泽、陈其元、薛福成、王闿运、王定安、李慈铭、翁同龢等人的文集、笔记和日记等有关部分。此外，作者对其他中外有关左宗棠的论著、资料与档案，也尽可能地参阅。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书是在搜集并钻研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二、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

作者对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办洋务的特点与局限、镇压陕、甘回民军、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收复新疆的意义和胜利的原因以及他在中法战争中的主张与表现等等，都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例如，关于左宗棠的爱

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作者通过对左氏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他的家庭情况和他的生活经历与社会关系的叙述，说明出身于乡村贫苦知识分子家庭的左宗棠，由于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痛苦，了解社会的弊端，所以他很早就产生了改革时弊的思想。他在探讨改革时弊的过程中，有机会和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陶澍和贺长龄、贺熙龄接触，受其影响；又利用在陶家教书的机会得读其丰富的藏书，从而确立起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后，经过鸦片战争对他的刺激，他又接受了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等人爱国主义思想和务实精神的启迪。当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士子，却已牢固地树立了改革时弊和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作者通过如上的论述，就向读者揭示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虽然同是清朝统治者的“中兴名臣”，但在外国侵略者的面前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曾国藩、李鸿章一贯奴颜婢膝，妥协投降；而左宗棠则坚决主张抗击任何入侵之敌，不但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新疆，而且到垂暮之年，还为抗击法国侵略者而自请奔赴前线。

三、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具体分析

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要求。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力求把左宗棠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具体的分析，从而做到褒贬适宜，功过分明。例如，过去论述洋务运动，对洋务派几个不同势力集团的代表人物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往往缺乏具体分析，因而笼统地把洋务派中的不同人物办洋务的出发点都说成是镇压人民反抗和维护封建统治；说他们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一味依赖洋人，缺乏变外国长技为自己长技的苦心，没有独立自主的气概，事事受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和操纵，粗暴

地阻抑了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等等。作者认为上述诸论断对于左宗棠来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作者指出：左宗棠办洋务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富国强兵”，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洗雪国耻。左在整个办洋务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自尊自信的精神。他在对外交涉中没有奴颜和媚骨；在创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他虽也雇用洋匠，但洋人一旦将技术教给了中国工匠，完成了合同所规定的任务，他就将其解雇。他坚持自造和自己管理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外国控制，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注重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作者还将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与李鸿章作了对比，指出：左宗棠从事洋务活动，前后不过二十年左右，而且其中十五、六年是在戎马生活中度过的。他不是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人物，所办洋务的规模与影响都不及李鸿章，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贵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却是李鸿章之流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作者在给予左宗棠以如上肯定之后，也这样指出：左宗棠对世界大势的认识，对外国的了解仍然是贫乏而肤浅的。他企图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出一些新式的船、炮，以为如此即可做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但事实上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历史早已表明，近代中国在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在镇压农民革命这一点上虽然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上，却并不相同。其中一些当权派在侵略者的压力下，妥协投降，而另外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则主张并敢于坚决抵抗。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和琦善，洋务运动时期的左宗棠与李鸿章，他们对待外国侵略者的不同态度就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情况。正由于这样，所以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与

作用也就完全不同：前者是功在民族的爱国者，是封建统治集团中难能可贵的进步人物，理应予以肯定、赞扬；而后者则是妥协投降派，有罪于民族，必须予以揭露与批判。

杨东樑同志撰写的这部《左宗棠评传》，在一些问题上，如论述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所以能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并较符合实际，关键在于从事实出发，进行具体分析，而这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人所周知，研究历史，首先应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抓住主要的矛盾。因为在各种矛盾交织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能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则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而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也就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其次，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并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叙述真实的历史过程，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如果我们对所研究的课题没有掌握全面而系统的材料，则在分析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当然就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过去对左宗棠的洋务活动所作的一些论断之所以不大符合左的实际情况，我觉得这与对左宗棠的有关资料进行搜集和研究都不够重视有关。目前，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正在日趋深入，这部书的出版，无疑将有助于这种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助于繁荣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学术文化。

1984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早期生活与思想·····	(1)
第一节 病入膏肓的封建衰世·····	(1)
第二节 家世和早年生活·····	(5)
第三节 “经世致用”之学的崇奉者·····	(13)
第四节 在鸦片战争中·····	(22)
第二章 参与镇压太平军·····	(28)
第一节 幕府生涯·····	(28)
第二节 独当一面,进军赣、浙·····	(57)
第三节 在闽、粤镇压太平军余部·····	(74)
第四节 左宗棠与“借师助剿”·····	(81)
第三章 左宗棠的洋务活动·····	(88)
第一节 爱国与向西方学习·····	(88)
第二节 马尾船政局与甘肃织呢总局·····	(94)
第三节 左宗棠办洋务的特点·····	(111)
第四节 在六、七十年代的对外交涉中·····	(121)
第五节 学习西方的悲剧·····	(130)
第四章 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	(135)
第一节 镇压捻军·····	(136)
第二节 镇压陕甘回民军·····	(149)

第三节	“剿抚兼施”政策与善后措施·····	(170)
第五章	收复新疆·····	(177)
第一节	新疆问题的由来·····	(177)
第二节	“海防”与“塞防”之争·····	(187)
第三节	收复新疆的准备·····	(197)
第四节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210)
第五节	西征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245)
第六章	左宗棠的从政活动与社会政治思想·····	(257)
第一节	从政活动·····	(257)
第二节	社会政治思想·····	(277)
第七章	“督师南下，遗恨平生”·····	(299)
第一节	整顿海防，筹画抗法·····	(299)
第二节	奔赴福州前线·····	(310)
后记	·····	(316)
附录一：	左宗棠家世简表·····	(318)
附录二：	左宗棠生平大事简表·····	(319)
附录三：	参考书目·····	(334)

第一章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和他的 早期生活与思想

第一节 病入膏肓的封建衰世

十八世纪后半期，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正急剧地走着下坡路，“康乾盛世”的金字招牌已经剥落，深刻的社会危机再也掩饰不住了，正所谓“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①此时的封建社会，确实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②

封建“衰世”之“衰”，据笔者看来，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空前严重。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有人这样叙述土地兼并的情况：“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③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疯狂地兼并土地，聚敛财富，象嘉庆（1796——1820）时权臣和坤占田达八千余顷，道光（1821——1850）时大官僚琦善拥有土地256

① 《红楼梦》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8页。

② 《尊隐》，《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页。

③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39。

万亩，嘉庆时湖南衡阳县富商刘某也田至万亩。^①不少的中、小地主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多数丧失土地，变成佃户，挣扎在饥饿线上。“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②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受到苛重的地租剥削，地租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嘉庆年间，有“各半分租”、“按半分收”^③的记载。正租之外，尚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租、预租和押租。农民既要负担沉重的地租，又须向清政府缴纳繁苛的赋税，而且“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故农民生活，“艰难实甚。”^④此外，农民还要受高利贷盘剥，“当丰岁则贱糶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莖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穷困”^⑤。这些商贾大族往往于“青黄不接之时”“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⑥，从而兼并土地。

第二，政治黑暗，社会风气败坏。当时，官场贿赂公行，几乎是无官不贪。有人在谈到留居北京的亲身感受时说：“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⑦嘉庆初年，大官僚和珅被抄家，其家产折合成银两，达四亿余两之巨，相当于清政府当时一年国库收入的七、八倍，由此可见，清廷权贵们刮取民脂民膏，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整个统治集团溃烂了，社会风气也随之败坏了。沈垚曾经这样评论说：“今日风气，备有元、成时之阿谀，大中时之轻薄，明昌、贞祐时之苟且。海

①③⑤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辑，第69、72、188页。

② 《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④ 俞樾等：《川沙厅志》（光绪五年）卷4，第18页。

⑥ 《东华录》卷103，乾隆五十一年五月。

⑦ 沈垚：《马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8。

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①元、成是指汉元帝、成帝，大中为唐宣宗年号，明昌、贞祐为金章宗、金宣宗年号。这几句话是说，当时的清朝，已集中了西汉末期及唐末、金末的种种坏风气。

第三，军队腐化。清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本是驰骋疆场，“每战必克”的劲旅，但入关后，由于“从龙”有功，不但贵族们得到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就是一般旗民也地位特殊，坐享钱粮。于是，八旗兵就迅速地腐化下去，到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变起（即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联合反清），八旗兵已差不多不能作战了。嘉庆十七年（1812），全国满、蒙、汉军八旗兵名义上有五十万人，但实际上兵额仅二十万左右，它已成为徒有虚名而缺乏战斗力的军队。“绿营”兵是清统治者入关后由汉人组成的职业兵（以绿旗为标志，故名），兵额不定，最多时全国达六十六万人（嘉庆时）。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主要依靠这支军队。但由于差务繁重，影响操练，军队素质不断下降，加以军饷菲薄，又常被克扣，士兵及其家属生活困难（绿营兵以吃粮为业，全家都靠月饷维持生活），因而不得不兼做小贩或做手艺以营生。这种情况，在雍正初年就已出现。乾隆末年以后，绿营兵日益腐化，到嘉庆年间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绿营兵已不中用，不得不依靠一部分乡勇的力量了。

除了上述种种问题之外，魏源还揭露了一些“为前代所无”的弊害：

“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

^① 沈森《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8。

货币漏海外，漕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①

魏源的这一段话，既说明了清朝统治者在经济、文化的某些方面已处于空前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也抒发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清朝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人民反抗的浪潮已势不可当了！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烽火延及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河南五省，坚持了九个半年头。清政府调动了十六个省的军队，耗费了二万万两军费，屠杀了几十万农民，才把这次起义运动镇压下去。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又发动天理教起义，从北京西郊直接袭击皇宫，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激战，歼敌甚多，嘉庆皇帝认为这是汉、唐、元、明以来“未有之祸”。这次起义也被清政府血腥地镇压下去。尽管两次农民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对清朝的封建统治却给予严重的打击；同时，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不甘受清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正酝酿着新的大规模的起义运动。

总之，当时所呈现的社会画面，正如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②

就在清王朝的封建大厦濒临崩溃之时，西方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正以大炮和军舰作后盾，打破中国的东南大门，大量输入鸦片。在西北，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也迅速向

① 《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第163页。

②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06页。

东扩张，决心用武力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

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这就是左宗棠活动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第二节 家世和早年生活

清仁宗（颙琰）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公元1812年11月10日）凌晨^①，左宗棠诞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墩（今湘阴县金龙乡新光村）。当时，他的母亲余氏已三十八岁，父亲左观澜也三十五岁了。左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为县学廪生。左氏虽世居湘阴县农村，却是所谓“书香门第”：左观澜的祖父左逢圣（字孔时）为县学生员（即秀才），父亲左人锦（字斐中）是国子监生。左观澜同他的父亲一样，虽然饱读诗书，却不能中举。他既做不了官，又没有多少土地，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遇上灾荒，甚至无以度岁。嘉庆十二年（1807），湘阴大旱，家里不得不“屑糠为饼食之。”^②当左宗棠诞生时，左观澜已经有了两个男孩（长子左宗棫，十三岁，次子左宗植，九岁）和两个女儿。他中年再得幼子，虽感到高兴，但妻子余氏没有足够的乳汁，需雇奶母而无钱雇之，婴儿“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③为了维持生计，左观澜不得不一面读书，一面教书。后来左宗棠回忆说：“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脩脯无从得食。”^④又说：“吾家积代寒素，先

①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光绪丁酉年湘阴左氏校刊本，以下简称《年谱》），卷1，第2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诗集·二十九岁自题小像》第四首自注。

③ 《左文襄公家书》（以下简称《家书》）上，第55页。

④ 《全集》，《诗集·二十九岁自题小像》第四首自注。

世苦况百纸不能详。”^①这都足以说明左家当时生活的拮据。

左宗棠三岁时，他的祖父左人锦就教他读书、识字。第二年，左人锦将全家迁到长沙，开馆授徒，并对身边这个最小的孙子进行严格的儒学训练，督之“读论、孟。”^② 这年秋天，左人锦病逝了。左观澜此时已年逾四十，因自己“功名”不遂，就“课子尤严。”^③ 嘉庆二十四年（1819），长子左宗械（时十九岁）进入县学，次子左宗植（时十五岁）进县学后经过科考，成绩名列前茅，被补为廪生。这些，都为望子成龙的左观澜带来了希望，因而他对小儿子也注重督教了。

左宗棠“九岁学作制义。”^④ 他“日诵所授书毕，即跳跟嬉戏。”^⑤ 不久，他的两个哥哥先后中了秀才，而以后考试亦颇为顺利：宗械补廪生，宗植由廪生被选为拔贡生。道光六年（1826），宗植进京参加“朝考”，列二等，被选为湖南新化县训导。也就在这一年，十四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去应童子试。次年应府试名列第二，但因母亲病重，未能参加学政主持的考试（即“院试”）而没有取得秀才的资格。

道光九年（1829），左宗棠已满十七岁。他好读经世致用之书，而没有把精力集中于猎取“功名”的制艺上。有一次，他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如获至宝，“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瞭如指掌。”^⑥ 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他

① 《家书》上，第40页。

②④ 《正直堂全书》卷首“左宫保书”（致杨浚书）。

③ 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年谱》卷1，第4页。

⑤ 《全集》，“文集”卷3，第29页。

⑥ 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年谱》卷1，第7页。

读书非常认真，并写了详细的笔记，“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①这样，就使他大大地开扩了眼界，掌握了某些有用的知识。但当时许多沉溺于时文的士子却对此加以讥议，左宗棠后来回忆说：“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②对这种悠悠之谈，他毫不理睬，仍然坚定地走着自己的求学道路。

道光十年（1830）正月，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患病，元宵过后三天，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三岁。左观澜读书半生，并没有给儿女们留下多少财产，“歿后遗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家用日不给。”^③宗植、宗棠兄弟二人（长兄宗械于道光三年病逝）不忧贫，励志治学。宗植当时在湖南已颇有文名，与魏源、陈起诗、汤鹏等号称“湖南四杰。”^④他为生活奔波，与宗棠分别，淹留外地。他在新化做了三年训导，很少与宗棠聚首，所以宗棠有“三年客邵陵，相见时亦稀”^⑤的诗句，抒发对他的怀念。

“早岁孤贫”^⑥的生活不但没有把左宗棠压倒，反而锻炼了他倔强的性格。他在弱冠之年，就抱负很大，“以诸葛亮自期，……与人书，辄署‘亮白’^⑦。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

① 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年谱》卷1，第7页。

② 同上。

③ 左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年谱》卷1，第11页。

④ 《湘阴县志·左宗植传》。

⑤ 《辛卯夏仲兄客武昌送别后却寄》，《全集·诗集》第1页。

⑥ 《全集》，“书牍”卷1，第1页。

⑦ 左钦敏：《湘阴人物传》第25--26页。

吾宗节。”^①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读“有用之书”上，学识见解，日益增进。

道光十年（1830）十月，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著称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母忧回到长沙。贺曾与江苏巡抚陶澍共同办理过漕粮、海运，并于道光六年请魏源以自己的名义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选入了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以来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年轻的左宗棠很佩服贺长龄的学问和为人，经常到贺家请教，甚为贺赏识，“以国士见待。”^②贺见他好学，愿将家中的藏书借给他阅读。他每次借阅时，“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断断，无稍倦厌”。^③他和贺长龄共同探讨学问，简直成了忘年交。

道光十一年（1831），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二哥宗植则客游武昌，兄弟俩把仅有的几十亩土地都留给了长兄宗械的遗孤——侄子世延^④。这样，左宗棠的生活更为艰难，“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⑤

长沙城南书院历史悠久，南宋时，朱熹曾在此讲学，有一定社会影响（院址在今长沙南区书院坪）。其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任湖北学政，于十年底丁忧回籍）。贺熙龄字光甫，号庶农，当年四十三岁，在湖南有些声望，“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⑥，他批评当时读书人的学风说：“夫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

① 《全集》，“书牋”卷5，第69页。

② 《全集》，“书牋”卷22，第16页。

③ 《全集》，“奏稿”卷67，第30页。

④⑤⑥ 主孝同：《先考事略》，转引自《年谱》卷1，第11、9、8页。